

“小孩小孩你别馋,过了腊八就是年”。童谣萦绕耳际,年味弥漫开来。

小时候,总巴望着过年。进入腊月,门廊下挂满了香肠、腊肉、腌制的鸡鸭鱼,一串串重笃笃的,那是大人们给“年”的献礼。白天,它们悬挂在门廊下或院子里两棵树之间的铁丝绳上晾晒。我们只能眼巴巴地仰望着那“晒”在门廊上的美食淌口水,不过没关系,我们很快发现了替代品——屋檐下悬挂着晶莹剔透的冰凌,我们称之为“凌锥”的宝物,找个小石子,瞄准一只大凌锥,甩开膀子扔上去,“噔噔噔”,几只被打残的凌锥,跌落在地,碎成冰块。我们争先恐后地扑过去,争抢锥尖,抢到的人得意地用乌七八糟的小脏手握住那块冰,夸张地嚼着那尖儿,仿佛它比糖还甜。总防贼般盯着我们的大人,那会儿正忙着炸焦叶子、蒸馒头、做圆子、酥鱼,我们这帮因“年”而被特赦的“小贼”,获得了自由,在大院里疯跑着,在环校渠的冰面上打陀螺、滑冰,到小树林子里爬树、捣鸟窝,不用做算术,不用背古诗,不用写大字,满脑子只有一个“玩”字!

到了腊月初七,家家开始泡糯米、洗红枣、剥花生、簸豆子,我们嘴上抹蜜似的,从这家窜到那家,衣袋里逛了满满一兜花生、红枣和瓜子、糖果,美美地吃完、玩好,回到家,凑到煤炉旁,炉子上那只大钢精锅发出咕嘟咕嘟的响声。还想再探究究竟,大人不允了,大喝一声“快洗洗睡去”。嘻,只要不是“快写作业去”就好。磨磨叽叽去洗了睡了,第二天醒来时,便闻到一股甜甜的枣香。被馋虫勾着,麻利地起床。那些前晚装进锅里各自为政的水、米、枣、豆,被炉火煨成彼此相融、密不可分的粥。那时,初学写大字,亦刚识得“粥”字,我用毛笔饱饱地蘸了墨,在纸上写“弓米弓”,字合不拢,不成一体。爸爸

旧年的早秋,父亲大人遽然而逝。半年来,我又在电脑上敲出数不清的文字,尽管多是空话、废话,但我没有写下一篇怀念父亲的文章。不是不写,几次提笔,几次放下,实在不知从何写起。搜索父亲一生,平凡与伟大,光荣与耻辱,平常与古怪,大方与吝啬等等,交织其中,欲理还乱。我需要一些安静的时间,来稍理一下自己的构思。

岁末还是热闹,备年货,清欠帐,慰孤寡,写春联。看朋友圈里,书法家们到处义务写春联,红红火火,喜气洋洋。如果父亲还在,他一定也在其中,以手中的文笔,以最喜庆的色彩,迎接着新春到来,以这世间最美的词汇,把新春赞美。

父亲是平凡的,自1970年供职于太湖县寺前镇文化站,当了一辈子的站长,最低等的政府小差。虽然父亲也有很多升迁机会,别人求之不得,但被父亲果断拒绝,这是他的古怪之处。父亲所做之事,单说上班,一年三百六十五日,至少要上三百六十天的班。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,故说父亲是伟大的,这种伟大非指做出丰功伟绩,而是一种平凡的伟大。也不能说父亲有怎样高尚的追求,他不过相对呆在

## 过了腊八就是年

黄丹丹



欢喜 储永志 摄

说,要收紧了去写,就像水米豆煮成粥,彼此黏在一起那样。煮了一夜的腊八粥真黏糊呀,用大铁勺舀出来,盛在雪白的瓷碗里,碗口一圈红色的梅朵儿,衬得那碗琥珀色的粥如画册上的美图。

某一年腊八,大雪封门。吃罢腊八粥,我要出门找小伙伴疯玩,被大人捉住,困在屋里。百无聊赖,看大人在煤炉上架了铁锅,炒葵花籽、炒花生。铁锅里放了沙子,大人用铁锅铲反复地翻炒,锅里噼里啪啦地响,焦香味终于冒了出来,大人拿只盛了盐水的碗,慢慢向锅里洒,此后又是毫无花样的翻炒。那个过程缓慢无趣得令我抓狂,太久的等待消耗了我的馋意。即便炒瓜子的香已袅袅,我也不愿再忍,挣脱了父母,打开门,冲进

雪野,在松软的雪地上跑啊、跳啊,团个小雪团吃呀。拥有自由比享用美食更令人快乐。

原来,在雪地里撒欢儿的可不止我一个,跑到前院的楝树下,小伙伴鹏鹏已经猴在树底下准备捕鸟了,他从口袋里掏出爆米花,把它们一颗颗立在雪地上,一只竹篾编制的筛子在他身后,他的脖子上还挂着一支弹弓,他示意我退后噤声,然后拉我躲在树干后“侦查”,他那副神神叨叨的样子令我很不屑。我躲了几十秒就宣布退出,哪里来的鸟?还侦查!我离去时,弯腰从雪地里抠了几颗冰凉的爆米花“诱饵”塞进嘴里,扬长而去。

路过伙夫丁伯伯的住所时,闻到了一股诱人的奇香。推门进屋,丁伯伯正坐在土灶后面拉风箱呢。

丁伯伯是我儿时居住的那所校园食堂的伙夫,食堂有一个很大的土灶,那灶上有两个巨型铁锅,一个用来煮米饭,一个用来炒菜。和我们家的煤炉不同,丁伯伯的灶不吃煤球吃柴火,断树枝、干茅草、秋天的落叶,统统成为“柴火”,把柴火塞进灶膛里点上火,很快就能把锅里的饭菜激得呼呼叫。那灶是我最为好奇的所在,可惜,对我非常友好的丁伯伯,却不允许我靠近他的灶膛。那会儿,丁伯伯边拉风箱边吹口哨,见我这个不速之客闯进门,他止住了口哨,问我冷不冷。我说冷呀,丁伯伯让我烤烤火吧。他笑我是个小鬼精,却不许我靠近灶膛。他让我站在边上背诗,我扭着脸赌气说:“不会!”“‘母鸡抱小鸡,木兰大步走’都不会了呀?”丁伯伯说。“什么呀,那是‘唧唧复唧唧,木兰当户织……’。”背完诗的我,获得了丁伯伯的奖赏,他从灶膛里变魔术般地刨出一根烧得奇香的山芋!

我正坐在小竹椅上吃山芋时,我爸推门进来,他端了一碗炒好的瓜子送给丁伯伯。那只豁口的蓝花大碗是丁伯伯给我们家送元宵面去的。那时候,邻里间爱分享食物,分享的器物归还时,从不空着。在物质匮乏的年代里,人们并不乏分享的热情。爸爸见我吃得正欢,沉了沉脸,拉我回家。回到家,我听到爸爸妈妈商议着,要给丁伯伯一条咸鱼。“老丁一个人拉扯个孩子不容易,囡囡还总去吃他的。”

雪过天晴,家家户户又把香肠、腊肉、腌制的鸡鸭鱼拿出来晾晒,丁伯伯家那原本光秃秃的门廊上,挂着一只瘪眼睛的鱼。丁伯伯的女儿燕青靠在墙根下晒太阳,她不时用生了冻疮的暗紫色小手,从罩衫的口袋里掏出瓜子送进嘴里,“噗”地吐一口,几瓣瓜子壳就飘飘悠悠地落在地上。地上还有残雪。大人说,待雪化掉,就过年了。

丧,不贴红春联,只能贴绿春联。我已决定,绿春联也不贴了,看了,想起父亲,徒生悲痛。亲友来聚,满屋欢乐。从来水往下流,只要我们过得快乐,就是父亲的遗愿。

春回大地,春回山村。春天也如人呀,天上天下,看着这世间百态。春天应该认得父亲,那个年年写着春联,迎接她,给她多少赞美的人,也应该对那个人满怀感谢。今年,当她经过我家门口,看不到红春联,是否就会想起那个人。如果她没想起,当她来到父亲的书房,看到一如往日的书桌,书桌上插满几个笔筒的毛笔(还有很大一把,已随父亲安葬),她一定会记起来的!并且为那个人的逝去而惋惜,哀痛。春天啊,你也不必哀伤,就请你多把几缕和煦春风,吹过那个人的坟头,多把一些春暖,洒在人间!



## 写春联的父亲

余世磊

家里,而更喜欢去上班,这又成为他平凡的一面。

打我幼年记忆开始,每年大年三十,全家吃过年夜饭,父亲还要去单位上班。大约从过小年开始,父亲的工作就是为人写春联。在镇区的单位与人,还有本镇和周围乡镇的人,同父亲交熟者太多,都拿了春联请父亲写。我跟父亲一起去过,逛过热闹的寺前镇街,便去文化站为父亲压纸拉纸。父亲忙个不停,墨汁用完一两瓶,写好的春联,铺满了几个房间,陆续被人们拿走。直到日过中午,所有人把春联拿走,才锁了文化站的门,和我们一起回家去。回家匆匆吃了午饭,而下午,又要为本屋场的人、其他屋场的人写春联。最后,给家写上一副春联,我和妹妹找浆糊,搭梯子,把对联贴好,新年的气息,新春的气息就在家弥漫开来。

进入1990年代,市场经济兴起,文化事业也进入艰难岁月,许多乡镇文化站名存实亡。父亲以他

实在的工作,找县、镇单位讨些钱,维持文化站的运转。年年难过年年过,年年写春联依旧。直到退休之龄,因为没有合适接班之人,又干上七八年才归故里。这些年,许多公司赠送春联多了,写春联的人少了,但父亲依然要忙着写上许多春联。犹记去年过年,镇上几个书家专门请父亲在街上写春联,写了一个上午。镇里王书记也登门来了,一是慰问,二是请父亲为镇政府大楼写春联。年年,政府大楼等单位所贴春联都中出自父亲之手。几张纸拼接,自撰内容,父亲在家要忙上一两个时辰。

算算,整整半个世纪,别的不说,父亲共为人写过多少春联?用过多少墨汁?真的是不计其数。我曾写过一篇文章《父亲的字》,谓父亲写得一笔好字,不过在文化站抄墙报、写春联中练就,缺少碑帖功夫,但字之间架掌握、圆润风格却是过硬功夫。

父亲去了,依民间风俗,家有